

异文化视野下的台湾原住民“统称”^{*}

吴春明

【摘 要】本文梳理在异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统称”的演变及存在的问题。历史上,台湾原住民被统称为“夷”、“番(蕃)”及“高砂(山)族”等,是外部世界、尤其是汉文化对于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缺乏深刻认知的背景下,附加于内涵复杂、文化多样的台湾原住民上的概括性“符号”,没有反映原住民各族群的自身认同、文化记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族称”。康、雍以来相继出现的“野”与“化”番、“生”与“熟”番,日据时代的“高砂(山)”与“平埔”蕃等两类称谓,也只是区分了原住民汉化程度的深浅,没有反映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别,仍无法摆脱模糊认知、笼统概括的误区。

【关键词】异文化;台湾原住民;统称

【作 者】吴春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4-0124-007

“Collective Name” to Taiwan’s Aborigin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Wu Chunm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evolution “collective name” of Taiwan’s aborigin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Historically, Taiwan’s aborigines were “collectively” named as “Yi”(夷), “Fan [Fan]”(番[蕃]) and “Gaoshas (shans)”(高砂[山]族). These names were general “symbol” which was imposed to Taiwan’s aborigines who had complex content and cultural diversity by the outside world, especially on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culture lacking a deep understanding on Taiwan’s aboriginal communities. So they didn’t reflect the own identity and cultural memory of aborigine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and they are not “ethnic title” in the strict sense. After Kangxi and Qianlong of the Qing Dynasty, it appeared “wild”(野) Fan and “assimilated”(化) Fan and “raw”(生) Fan and “cooked”(熟) Fan. In Japanese occupation era, it appeared “Gaoshas (shans)” and “Pingpu” aboriginal title. The above-mentioned two types of title only distinguished the extent of aborigines becoming Chinese, and didn’t reflec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so we still can not get away from the errors of vague awareness and general summary.

Key words: cultural differences;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collective name

“台湾原住民”是指明郑以来华南汉人大规模迁台之前居住在台湾岛上的土著族群,分别是自石器时代以来不同阶段自东亚大陆和东南亚群岛迁徙到台湾岛上的,是一个内涵复杂、文化多样、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6 年度重大项目“台湾原住民研究”(2006JJDGT002)课题成果。

种族语言明显差异的土著民族群体。但是,由于原住民缺乏本民族自身的文献历史,原住民的族群确认、记忆塑造都是建立在异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视野下。由于跨文化的粗放、笼统认知,在华夏、汉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的多样内涵、族群差异长期未被重视,台湾原住民被视为基本同一,历史上相继被“统称”为“夷”、“番(蕃)”及“高砂(山)族”等。这些异文化视野下的“统称”,将原住民的不同族群文化予以概括性的命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族称”,这些“统称”的变化反映了古代“中国(中心)一四方(边缘)”框架内原住民认知、族群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

一、汉唐宋元间的“山(岛)夷”与流求“土人”

汉唐间,台湾“山夷”、“岛夷”最早进入汉民人文的视野。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是第一篇详尽描述台岛“夷州”土著“山夷”的篇章:“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磨砺青石以作矢鏃刃斧。环贯珠珰。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饮食皆踞相对,凿床作器如稀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歌似犬噪,以相娱乐……得人头,斫去脑,剥其面肉,留置骨,取犬毛染之以作鬓眉发编,具齿以作口,自临战斗时用之,如假面状。……女以嫁皆缺去前一齿。”书中所记“山夷”人文与近代民族志台湾原住民生活仍然吻合。^①唐代,施肩吾《岛夷行》仍将台湾土著称为“岛夷”,所谓“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鹹水。”^②

在唐宋正史中,多以“(流求)土人”泛称台湾原住民。《隋书·流求传》是第二篇系统描述台岛“流求”“土人”的文字,“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彼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罗檀洞,重柵三重,环以流水,荆棘为藩。……人深目长鼻,颇类于胡,亦有小慧。……妇人以墨鲸手,为虫蛇之文。……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人间门户上必安兽头骨角。”其事也多延续前引沈志人文,与近现代台湾土著民族志吻合。

赵汝适《诸蕃志·流求国》也有:“流求国当泉州之东,舟行约五六日程。王姓欢斯,土人呼为‘可老’,王所居曰波罗檀洞。重柵三重,环以流水,荆棘为藩,殿宇多雕刻禽兽。男女皆以白纁绳缠发,从后头盘缠绕,及以杂纁杂毛为衣,制裁不一。织藤为笠,饰以羽毛。”《宋史·外国传·流求国》:“流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澎湖,烟火相望。其国重柵三重,环以流水,荆棘为藩,……旁有毗舍耶国,语言不同,袒裸睚眦,殆非人类。”所记土著社会均与《隋书》大同。《元史·外夷列传·瑠求传》、汪大渊《岛夷志略·琉球志》也有类似的篇章。

汉唐宋元间台湾原住民虽在汉文史籍中具有“山夷”、“岛夷”、流求“土人”等不同“称谓”,但这些名称的字面实际意义只是“岛屿带的非我族类”,并没有标明特定族群的文化特点,看不到族群差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族称”。明清以来,台湾原住民的多种“统称”也同样延续这一笼统、含混的特点。

二、明代统称“东(土)番”

明清时代,台湾原住民多被统称为“番”,由于“番”自身的发展变化和汉人对此“番”的认知有所深入,清代的统称中也逐步有了分类。而在明代,“岛夷”、“土人”还偶有出现,但台湾“番人”多被汉人称为“东番”、“东番夷人”、“土番”等。

《明史·外国列传》载:“鸡笼山在澎湖屿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去泉州甚迩。……永乐中,郑和遍历东西洋,靡不献琛恐后,独东番远避不至。”

何乔远《闽书》卷一百四十六“岛夷志”语:“东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岛中。

……断续凡千余里,种类甚蕃,别为社,……永乐初,郑和航海谕诸夷,东番独远避不听从。”^③

陈第《东番记》语:“东番夷人,不知所自始。野史氏曰:异哉东番!从烈屿诸澳乘北风航海,一昼夜至澎湖,又一昼夜至加老湾,近矣。”屠隆氏《平东番记》语:“东番者,澎湖外洋中夷也。”^④

杨英《从征实录》有“土番”、“土民”语,如十五年(1661年)五月十八日“本藩令谕云:不准混圈土民及百姓现耕田地。”七月“援剿后镇、后冲镇官兵激变大肚土番叛,冲杀左先锋镇营。”十六年(1662)“英随藩主十四年许矣,扈从历遍,未有如此土地膏腴饶沃也。惜乎土民耕种,未得其法,无有人教之耳。”^⑤

可见,明代汉民人文视野中的台湾原住民除了延续唐宋时期的“岛夷”、“土人”外,主要是以“番”称之,但“东番”、“东番夷人”、“土番”称谓仍将原住民视为同一,而不见对原住民不同族群的文化区分。

三、清代“生(野)番”与“熟(化)番”的两类区分

入清以后,尤其是康熙统一后,原住民虽仍多统称“土番”,但逐步开始有“野番”、“生番”与一般“土番”的区别对待。从康熙晚期开始,更有“生(野)番”与“熟(化)番”两大类的区分。

康熙三十三年,高拱乾《台湾府志》卷七“风土志”有“土番”和“汉人”风俗之别,“土番之性,与我人异者,无姓字,不知历日,父母而外,无叔伯甥舅,无祖先祭祀,亦不自知其庚申。”卷一“封域志·疆界”就有“生番”与一般“土番”的区分,“(台湾)南至沙马矶头六百三十里为界,是曰南界,矶以内诸社,汉番杂处,耕种是事,余诸里、庄,多属汉人。北至鸡笼山二千三百一十五里为界,是曰北路,土番居多。惟近府治者,汉、番杂半。至于东方,山外青山,透南亘北,皆不奉教,生番出没其中,人迹不经之地。延袤广狭,莫可测识。”^⑥

康熙三十六年,郁永河《裨海纪游》中还有“野番”与一般“土番”之别:“台之民,土著者是为土番,言语不与中国通,况无文字,无由记说前代事。”“(凤山)摄土番十一社,……另有傀儡番并山中野番,皆无社名。……三县(台湾、凤山、诸罗——引者注)所隶,不过山外沿海平地,其深山野番,不与外通,外人不能入,无由知其概。”又“诸罗、凤山无民,所隶皆土著番人。番有土番、野番之别,野番在深山中,叠嶂如屏。……平地诸番恒畏之,无敢入其境者。而野番恃其犷悍,时出剽掠,焚庐杀人,已复为其巢,莫能向途。”^⑦

就是说,清代前期统称台湾原住民为“土番”之时,开始将深山偏远地区的“土番”另称为“生番”或“野番”,就是说“生番”或“野番”都是“土番”的一部分,是“土番”中不与汉人往来的部分。

随着内地汉民迁台屯垦的规模扩大、理番事务的深入,部分原住民汉化加速,康熙晚期开始将与汉人往来密切的“归化”“土番”称为“化番”、“熟番”,形成了汉民人文视野中台湾原住民“生(野)番”与“熟(化)番”两大类的明确区分。

康熙五十六年周钟瑄的《诸罗县志》卷八“风俗志·番俗”载:“山高海大,番人禀生其间,无姓而有字。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野番。”^⑧

康熙六十一年,蓝鼎元在《粤中闻台湾事论》一文中说:“台湾土番,有生、熟二种,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皆以鹿皮蔽体,耕山食芋,弓矢镖枪,是其所长。……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相安耕凿,与民无异。”^⑨

同时期的鲁之裕《台湾始末偶纪》语:“台湾闽海诸岛之饶也,……其番有生者熟者,其聚族而居之所曰社,合台湾之社有三百五六十彦,其社有生番、熟番,生者何?不与汉群、不达吾言语者也。熟者何?汉番杂处、亦言吾言、语吾语者也。”^⑩

乾隆六年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六“土番风俗”引“台湾志略”语:“台湾僻处海外,

向为土番聚居，自归版图后，遂有生、熟之别。生番远住内山，近亦渐服教化。熟番则纳粮应差，等于齐民。^⑪

当然，原住民的“归化”是一个很复杂的文化融合现象，用两个简单的概念不可能就将汉化与否则截然区分开来，所以乾嘉以来的史志上还不时有“归化土番”、“归化生番”这样的介于“生番”与“熟番”之间的人群。如上引刘志卷六“土番风俗”引《理台末议》语“台湾归化土番，散处村落，……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未婚者夜宿公廨，男女答歌相慕，悦而后为夫妇，拔去前齿。”卷五“坊里附番社”语：“（凤山县）加六堂社、郎娇社俱归化。”“（诸罗县）内优六社皆归化生番。……阿里山八社皆归化生番。”“（彰化县）夫裏社至此二十四社，在水沙连山内，为归化生番。”“（淡水海防厅）三朝社……以上四社，乾隆二年归化生番。”^⑫但这不影响清代对原住民“生（野）番”与“熟（化）番”两大类的主流认知。

总之，清代汉人眼中的台湾原住民总体上仍称“土番”，而依原住民的“归化”、汉化程度区分为“生（野）番”与“熟（化）番”两类，主要是满足清政府推进理番事务、加强土著社会管理的需要，虽也反映了当时原住民社会的某个方面（汉化程度）的差别，但终究不是依据族群文化差异做出的民族学意义上族群区分。清代汉民人文视野中的台湾原住民“生（野）番”与“熟（化）番”两类，与原住民多样文化的内在差异没有对应关系，仍是原住民族群文化上笼统、含混的“统称”。

四、日据以来的“高砂（山）族”与“平埔族”及其由来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殖民者对台湾原住民的早期认知延续了清代“生、熟”番的二分格局，1935年起又以“高砂族”、“平埔族”分别取代“生蕃”、“熟蕃”两个名称。战后台湾回归，两岸民族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分别称“高砂族”为“山胞”、“高山族”，而采信“平埔族”已经汉化消亡。

日据初期，日本殖民者维持对台湾原住民“生、熟”两类的区分的格局，唯因日本殖民当局将“番”改为“蕃”，将原住民区分为“生蕃”、“熟蕃”两大类，反映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著述上，如东京人类学会的伊能嘉矩和栗野传之合著的《台湾蕃人事情》（1900）、伊能嘉矩的《台湾蕃政志》（1904）、森丑之助《台湾蕃族志》（1917）等，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及“蕃族调查会”的佐山融吉的《蕃族调查报告书》八册（1913 - 1921年）、小岛由道等的《蕃族惯习调查报告书》八册（1915 - 1920年）、岗松参太郎的《台湾蕃族惯习研究》八册（1918 - 1921）、森丙牛《台湾蕃族志》（1917）和《台湾蕃族图谱》二册（1918）、小泉铁的《蕃乡风物记》（1932）、《蕃社户口》（1913 - 1943）等。^⑬

1935年起，日本殖民当局“台湾总督府”提出以“高砂族”和“平埔族”取代“生蕃”和“熟蕃”的称谓，并出现于此后的原住民调查研究著述中，如台北帝大土俗人种学研究室的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马渊东一合作的《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的研究》（1935）、语言学研究室的小川尚义和浅井惠伦合著《原语高砂族传说集》（1935）、马渊东一的《中部高砂族的祭团》（1937）、《中部高砂族父系中的母系地位》（1938）、台湾总督府《高砂族调查书》（1936 - 1939）等。^⑭

“高砂”是十六世纪以来日本人对台湾的称呼，日语音 Takasago，有人认为来源于中古以来日本船家航行南洋时多驻泊停靠台湾北海岸的“鸡笼头”（今基隆港），日语“鸡笼头”音近于“高砂”；也有认为就是日人以台湾地形“高山”音转“高砂”而来。^⑮

以“高砂族”、“平埔族”取代台湾原住民“生蕃”、“熟蕃”者，与日据前期日本民族学者对原住民调查研究中的认识提高有关，他们逐步意识到将原住民称为“番（蕃）”包含有种族歧视的成份，最终促成殖民当局采用“高砂族”、“平埔族”。同时，与康雍以来“生番”、“熟番”的居住环境差异更有密切关系，尤其到了清代晚期，划界分治强化了界外山地、界内平原两群“土番”的差别，形成了“山地（山后）生番”与“平地（平埔）熟番”的实质区分，这才是日据以来“高砂

族”、“平埔族”两类分别取代“生蕃”、“熟蕃”的内在原因。

清代影响汉番融合、原住民“归化”程度以及“生、熟”二番区分的重要因素是台湾岛内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别,最根本的是“土番”社会与汉人迁台聚居之西部沿海平原的距离远近、倚山与平地环境的差异。前引蓝鼎元在《粤中闻见台湾事论》、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土番风俗》中“生、熟二种”的差别都提到“深居(远住)内山”与“杂居平地”。清政府为有效管理台湾社会,多次在“生、熟番”所在的内山与平地之间设置墙壕界限“土牛”与“土牛沟”,如康熙六十一年就在各山口“筑土墙高五、六尺,深挖壕堑,永为定界。越界者以盗贼论。如此则奸民无窝顿之虞,而野番不能出为害民矣。……一千五百余里之界墙,一千五百余里之壕堑,大工之役,海外仅闻。”^⑩直到道光十七年,柯培元《噶玛兰志略》卷十二“蕃市志·番界”还记载:“开兰事宜条奏内准于沿山隘察之外,以五里为率,划界堆筑土牛。凡民人采樵,毋许越界起畔。查番俗杂记谓: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者,议凡逼近生番处所,相去数十里或一里余,竖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⑪

划界隔离强化了内山与平地原住民的“生、熟”差别,并大致形成了“山后(倚山)番”与“平埔(地)番”、“界外番”与“界内番”两组以地理环境区分的族群称谓。雍正八年陈伦炯《东南洋记》有:“台湾居辰巽方,……西面一带大野,东面俯临大海。附近输饷赋应徭者名曰‘平埔’土番。其山重叠,野番穴处,难以种数。”^⑫前引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五“坊里·附番社”对土番的区分中,除“归化生番”、“熟番”外,还有“倚山熟番”、“平地熟番”、“平埔熟番”、“山后生番”等类,如“(诸罗县)大武垵头社……以上四社倚山熟番。目加溜湾社……以上八社平地熟番。”“(彰化县)西螺社……以上十一社平埔熟番,……南社……以上六社边海熟番。”“(淡水海防厅)后垵五社,俱平埔熟番。……蛤仔难三十六社,皆山后生番。”^⑬

虽然居住地地理环境的差别不能绝对等同于原住民汉化与“生、熟”的程度,但确实是密切关联的,尤其到清代晚期界外的山地(后)土番一般就是指“生番”,而界内的平地(埔)土番一般就是指“熟番”。正如道光初年邓传安《台湾番社纪略》所说:“台湾四面皆海,而大山亘其南北,以西民番杂居,山以东有番无民,番所聚处曰社,于东西之间分疆画界,界内番或在平地,或在近山,皆熟番也。界外番或归化或未归化,皆生番也幸沾。”^⑭又前引柯培元《噶玛兰志略》卷十二“番市志·生番/熟番”条对山地之生番和平埔之熟番也有明确的对比,“山根之下,远望则层峦叠嶂,皆由东南而驱西北,近至山脚,则皆两山对列,其中有鸟道蹊径,一似天生门户,容生番出没者生。”“兰地三十六社化番独散处于港之左右,以渔海营生,故俗又谓之平埔番,实以其居于荒埔平旷之地,为土番而非野番也。”^⑮

可见,日据时代以来的“高砂(山)族”与“平埔族”两类从本质上说就是清代“生番”与“熟番”两类“统称”,只是“生番”、“熟番”的代名词,更名的原因是高山、平地两类地理环境差别是影响康乾以来“土番”社会汉化、“归化”的决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砂(山)族”与“平埔族”两类称谓的性质完全等同于清代的“生番”与“熟番”,同样是原住民族群文化上笼统、含混的“统称”,而不具有区分族群文化差异的近代民族学意义上的“族称”价值。

五、台湾原住民“统称”的问题

综上所述,台湾原住民作为华夏人文视野中的“他文化”,汉唐间“被称”为“山夷”、“岛夷”、“(流求)土人”;明代为“番”、“东番”、“土番”;清代仍为“土番”,但相继有“野番”(“生番”、“山后番”)与“化番”(“熟番”、“平埔番”)区别对待;日据时代相继有“生蕃”与“熟蕃”、“高砂族”与“平埔族”的区分;战后两岸又分别将台湾原住民称为“山胞”、“高山族”。“族称”是具有特定文化之民族或族群的称谓,其前提应是特定民族文化特征的客观存在并对其有基本的辨识,或是本民族的自觉认同和“自称”的记忆,应一定程度上反映特定民族的文化内涵特点或历史来源。从这点上说,上述诸多台湾原住民的“统称”并不具备这一近代民族学上“族称”的意义,没有反映土著族群历史与文化的真实状况,因而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这些称谓都是对台湾原住民各族群整体概括的“统称”,是近二千年来以华夏人文为核心的外部世界对于台湾原住民的族群文化缺乏深入了解的背景下出现的模糊、笼统的概括,并不是对原住民族群文化特点精确辨识基础上的恰当的定名。在“中国-四方”、“华夏-边缘”为特征的古代东亚族群关系宏观格局下,随着强势的华夏、汉民族文化从“中心”向“边缘”的扩展、接触、冲突与融合,对四方文化的辨识取决于华夏、汉民人文扩展、推进的速度和认知的深度。由于认知的差别,在华夏、汉文化视野中既有巴、楚、越、吴、闽等具有较确定的时空存在、鲜明的文化传统、具体的内涵特征并被明确“定名”的四方族群,还有不少认知有限、没有明确辨识而只是被笼统地概括在“蛮”、“夷”、“戎”、“狄”等范畴中的人群。在中文语境中,“蛮”、“夷”、“戎”、“狄”、“番”等并没有特指的时空存在、特定族群的文化传统,这些“名称”仅仅是站在华夏优越、大汉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严华夷之别”,模糊、笼统地概括了东、西、南、北的“非我族类”,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东、西、南、北四方“少数民族”,根本不是特定族群的称谓。台湾原住民长期被“统称”“夷”或“番(蕃)”,这些“称谓”同样只是模糊笼统地概括了台湾岛上的“非我族类”,并不是基于华夏、汉民人文对台湾原住民文化的准确认知。而且,在汉文史籍中“夷”、“番”还大量用于概括台湾以外的“非我族类”,如“东夷”、“吐蕃”,甚至海外世界的异族人群也都以“夷”、“番”来概括,如赵汝适《诸蕃志》、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就有大量海外“夷”、“番”人群,正史中也有很多混用的,如《明史·外国列传》记载台湾“东番”的同时,也说“红毛番泊舟于此(台湾)”事。因此,汉唐至明清华夏人文视野中的“夷”、“番”等类“统称”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族称”。

其次,康熙以来在汉民人文视野中出现了台湾“土番”社会汉化程度深浅的认知,并给予区别对待、称谓各异,也同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不同族群的辨识与“族称”。康熙以来相继出现的“野番”与“化番”、“生番(蕃)”与“熟番(蕃)”、“山后番”与“平埔番”、“高砂蕃”与“平埔蕃”等有关台湾原住民的两类区分、两种称谓,并没有反映原住民不同族群的文化传统、内涵特点或种族的差别,只是区分了原住民社会汉化与否、或汉化程度深浅、或居于山地与平地的两类,从本质上说还停留在“严华夷之别”、画定“非我族类”的认知水平,并不代表原住民族群文化来源、性质上的两个不同系统,仍然是一种模糊、笼统的族群“统称”。而且,将原住民的汉化程度标示为由“生”到“熟”、由“野”到“化”的差别,更进一步突显了“华夏-边缘”视野下的大汉族中心主义,是“严华夷之别”不良心态的极端表现。日据后期以来的“高砂族”、“高山族”、“平埔族”虽然从形式上摆脱了“夷”、“番”在族群“统称”的误区,但这几个名称从本质上也只是清代“野番”与“化番”、“生番”与“熟番”、“山后番”与“平埔番”的替代语词,因此仍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对原住民族群文化模糊认知、笼统概括的误区。

最后,由于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缺乏本民族的文献历史,保留在汉文史籍中的有关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辨识、称谓,都只是汉民人文的话语,是华夏、汉民人文外部视野下的粗放的认知,是外部世界附加于内涵复杂、形态多样的台湾原住民身上的概括性“符号”,终究不是反映原住民各族群自身认同、文化记忆的“自称”。

日据后期以来,随着日本近代民族学的兴起及其在台湾原住民族群中的实践,日本学者除了将台湾原住民“统称”为“生、熟”二蕃和“高砂”、“平埔”二“族”之外,台湾原住民多样的族群文化也得以逐步的认识与记录。迄今认识的台湾原住民包括了“高山族”的10个族群,如东北部山地的泰雅族(Atayal)、赛夏族(Saisiyat)、中部山地的曹族(Tsou)、邵族(Sau)、中东部山地与沿海的布农族(Bunun)、鲁凯族(Rukai)、卑南族(Puyuma)、阿美族(Ami)、东南部的排湾族(Paiwan)、兰屿岛的雅美族(Yami)等,和“平埔族”的近10个族群,如北部、东北部平原的凯达格兰族(Ketagalan)、噶玛兰族(Kavalan),西北部、中西部平原的道卡斯族(Taokas)、巴则海族(Pazeh)、拍瀑拉族(Papora)、巴布萨族(Babuza)、洪雅族(Hoanya),西南部平原的马卡道族(Makatao)、西拉雅族(Siraya)等,一般认为“平埔族”已基本汉化,长期未获当局承认。^②从来源上说,台湾的史前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多时空、多样的体系,包括了旧石器时代(距今30000

- 5000 年) 的长滨文化, 新石器早期 (距今 6000 - 5000 年) 的大坌坑文化, 新石器中晚期 (距今 5000 - 2000 年) 西海岸各地的芝山岩文化、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牛骂头文化、营埔文化、牛稠子文化、大湖文化, 东海岸的卑南文化、麒麟文化, 早期铁器时代 (距今 2000 - 400 年) 分布各地的十三行文化、番子园文化、大邱园文化、葛松文化、龟山文化、静埔文化等。这些史前文化的主体应是不同史前阶段自华南沿海地区渡海来台的, 同时在新石器晚期和早期铁器时代东海岸的一些支系文化很可能还受到来自菲律宾等东南亚史前文化的传入与影响。^③一般认为, 台湾史前文化类型的多时空格局与台湾原住民的多样族群文化有密切的源流关系。^④因此, 台湾原住民是一个来源多样、文化复杂的族群群落, 并非一个文化整体, 从异文化角度将原住民笼统、含糊地“统称”为“夷”、“番(蕃)”及“高砂(山)族”等, 都混淆了不同族群的文化内涵。上述已被台湾行政当局承认的“高山族”10 个族群的名称, 回归了原住民各族群的自身立场和族群记忆, 凸显了各族群文化间的文化差异与内涵特点, 应是未来讨论、研究台湾原住民文化的立足点。

注释:

- 沈莹撰、张崇根辑注:《临海水土志》第 1 - 5 页,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 连雅堂《台湾通史》卷一“开辟纪”, 台湾众文图书公司 1979 年。
- 何乔远:《闽书》第五册, 第 4359 页,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 沈有容《闽海赠言》引陈第《东番记》、屠隆《平东番记》, “台湾文献资料丛刊”第八辑, 台北大通书局 1984 年。
- 杨英:《从征实录》第 189 - 193 页, “台湾文献资料丛刊”第六辑, 台北大通书局 1984 年。
- 高拱乾《台湾府志》, “台湾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 台北大通书局 1984 年。
- 郁永河:《裨海纪游》第 9、11、32 页, “台湾文献资料丛刊”第七辑, 台北大通书局 1984 年。
- 周钟瑄《诸罗县志》, “台湾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 台北大通书局 1984 年。
- 蓝鼎元:《粤中凤闻台湾事论》, 载《鹿洲初集》卷十一, 引自《鹿洲全集》第 235 页,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 鲁之裕:《台湾始末偶纪》, 载《式馨堂文集》卷七“记”, 引自“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50 第 398 页, 北京出版社 1998 年。
- ①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 “台湾文献资料丛刊”第二辑, 台北大通书局 1984 年。
- ②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 “台湾文献资料丛刊”第二辑, 台北大通书局 1984 年。
- ③刘斌雄:《日本学人之高山族研究》, 载黄应贵主编《台湾土著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 年。
- ④刘斌雄:《日本学人之高山族研究》, 载黄应贵主编《台湾土著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 年。
- ⑤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上册第 75 页; 潘英:《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源流》, 第 58 页, 台原出版社 1998 年。
- ⑥蓝鼎元:《复制军迁民划界书》, 载《东征集》卷三, 引自《鹿洲全集》第 557 页,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 ⑦柯培元《噶玛兰志略》, “台湾文献资料丛刊”第二辑, 台北大通书局 1984 年。
- ⑧陈伦炯《东南洋记》, 载《海国闻见录》第 11 页, “台湾文献资料丛刊”第七辑, 台北大通书局 1984 年。
- ⑨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 “台湾文献资料丛刊”第二辑, 台北大通书局 1984 年。
- ⑩道光初年邓传安《台湾番社纪略》, 载《蠡测汇钞》第 3 页, “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 - 中华书局 1985 年。
- ⑪柯培元《噶玛兰志略》, “台湾文献资料丛刊”第二辑, 台北大通书局 1984 年。
- ⑫王雪明主编:《台湾原住民之美》, 台湾“行政院文建委”2002 年出版; 刘还月:《寻访台湾平埔族》, 台湾常民文化 1995 年版。
- ⑬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 《考古》1979 年 3 期; 臧振华:《台湾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载《东南考古研究》第二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吴春明:《台湾西海岸史前文化进程的初步分析》, 载《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 ⑭Tsang Cheng - hwa, The Archaeology of Taiwan, Council of Cultural Affairs, Executive Yuan, ROC, 2000.

[责任编辑: 陈家柳]